

周
斌
○
主
编



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 发展研究报告 (2016卷)

ZHONGGUO DIANYING DIANSHIJU HE HUAJU FAZHAN YANJIU BAOG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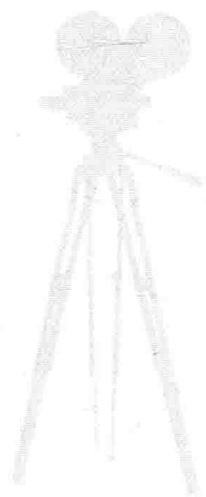
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
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周
斌
○
主
编



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 发展研究报告（2016卷）

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
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发展研究报告(2016 卷)/周斌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309-13234-2

I. 中… II. 周… III. ①电影事业-研究报告-中国-2016②电视剧-研究报告-中国-2016
③话剧艺术-研究报告-中国-2016 IV. ①J992②J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4859 号

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发展研究报告(2016 卷)

周 斌 主编

责任编辑/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6 字数 392 千

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234-2/J · 341

定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 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以鑫	厉震林	刘海波	吴保和
李建强	杨晓林	杨新宇	陈犀禾
周 斌	金丹元	荣耀明	聂欣如

编辑部主任：杨新宇

目 录

第一辑 年度特稿

新世纪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创作的新拓展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95 周年

周 斌 2

红军长征题材故事片创作评析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龚金平 19

论话剧《日出》现代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纪念话剧《日出》诞生 80 周年

曹树钧 31

论仲星火的表演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

——纪念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仲星火逝世 2 周年

周 斌 45

第二辑 宏观论析

论中国电影导演新力量

——关于新力量的合法性、香港模式和未来展望之研究 陈犀禾 刘吉元 56

2016 年国产电影表演美学述评

厉震林 罗馨儿 68

2016 年国产电影音乐创作述评

李 果 82

2016 年国产动画电影综论

杨晓林 戚雯悦 97

讲好中国故事 表达中国观点

——2016 年中国纪录片观察

吴保和 114

网台联动格局下的电视剧江湖新秩序

——2016 年中国电视剧创作评述

刘海波电视剧研究小组 133

喧嚣与骚动

——2016年话剧演出回顾

张晓欧 155

第三辑 理论批评

切近创作塑造自我

——2016年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述评

李建强 166

2016年中国电视剧研究现状分析

李昱嘉 金丹元 191

2016年中国动画理论综述

聂欣如 王 嵘 204

2016年中国纪录片理论研究综述

王 培 222

2016年中国话剧研究综述

王雪平 杨新宇 238

第四辑 热点评议

《湄公河行动》:主旋律大片的里程碑

杨新宇 258

从《美人鱼》看周星驰电影风格的延续与嬗变

张咏絮 261

《百鸟朝凤》里的“传统”,及对“传统”的反思

谈 洁 271

《寒战2》:香港警匪片的拓展与突破

徐 巍 277

表现地域文化 凸显民族风格

——评动画片《少年师爷之大禹宝藏》

周 斌 284

从《大鱼海棠》的“得”与“失”中探索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之路

刘 飞 289

电视剧《欢乐颂》的文化反思

张咏絮 295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艺术创作评析

王一璠 304

纵使相逢若别离

——电视剧《小别离》评析

孙晓虹 310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评电视剧《海棠依旧》

李 雯 315

从《上阳台》看环境戏剧的表演风格

游 溪 323

国不可以不救

——评话剧《雨花台》

段涵琦 330

第五辑 名家新作

冯小刚的平民叙事和家国神话

——从故事片《我不是潘金莲》说起

陈犀禾 翟莉滢 338

一段难忘岁月 一曲党建颂歌

——评故事片《难忘的岁月》

周 斌 349

类型融合的新尝试

——评曹保平导演的故事片《追凶者也》

李 欣 356

影像世界的虚构真实与真实虚构

——评陆川导演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

李晓婧 林国淑 361

第六辑 新人新作

欲望的“守”与“变”：《驴得水》中有关欲望诉求的三个维度

——评周申、刘露编导的故事片《驴得水》

贺 昱 368

《长江图》：亦真亦幻世界的时空并置

——评杨超编导的故事片《长江图》

冯 果 韩鸿滨 375

尘世的诗性救赎之旅

——评毕赣导演的故事片《路边野餐》

胡小兰 382

《中国式关系》：反大众的大众逻辑

——评沈严导演的电视剧《中国式关系》

徐 巍 391

国产都市情感剧创作亟待突破瓶颈

——评刘新导演的电视剧《爱情万万岁》

艾 青 394

主旋律戏剧的另一种表达

——评赵激编剧的话剧《起飞在即》

孙韵丰 399

后记

周 斌 405

第一辑

年度特稿

- 新世纪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创作的新拓展
- 红军长征题材故事片创作评析
- 论话剧《日出》现代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论仲星火的表演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

新世纪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创作的新拓展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95 周年

周 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适应了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的创作在国产电视剧的拍摄中开始勃兴起来,不少影视创作生产机构陆续拍摄了一批这方面的作品,其中有些剧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仅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而且由此探索了此类电视剧创作拍摄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使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成为传记剧创作的一种重要的类型样式。

新世纪以来,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的创作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明显的新开拓,相继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在重庆》《刘少奇的故事》《陈云》《聂荣臻》《毛泽东三兄弟》《领袖》《家国纪事》《开国元勋朱德》《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彭德怀元帅》《海棠依旧》等一批各具特色、颇具影响的剧作,这些作品与此前拍摄的同类剧作相比较,无论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手法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探索和新的拓展,从而为国产传记剧的创作拍摄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由于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既是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一种主要类型,也是传记剧创作的一种重要样式,所以对新世纪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创作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探讨,以利于此类电视剧创作的繁荣发展和艺术质量的不断提高,是非常必要的。

一、于路线斗争中见精神

众所周知,不少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经历往往贯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一生经过了许多艰苦曲折的斗争,其中既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抗敌御侮的民族斗争,也有尖锐复杂的党内路线斗争,而正是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凸显出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忠贞品格。因此,选择他们各具特色的斗争生活经历作为传记剧的主要叙事情节,乃是此类电视剧创作的常用方法,也是其共同的特点。

但是,由于表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情况会涉及一些较敏感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对此如何进行恰当的艺术处理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则颇费斟酌,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或批评,并影响电视剧的播放;所以此类传记剧在创作时往往以这些人物在战争年代与各种军阀的斗争、国共两党两军的斗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以及为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作为主要叙事情节,以此来表现他们在对敌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革命信念、坚定立场与奉献精神;而在较大程度上回避或简化了中共党内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并且也淡化了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经历。显然,这样的艺术构思和情节安排,对于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的创作来说,不仅其内容不够充实完整,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难以对其进行准确、恰当的历史评价。

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共党史研究不断深入开展,一些新观念、新方法得以运用;同时,不少过去被封闭的史料得以解禁,许多新史料也被陆续发掘出来,所以党史研究领域和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有了进一步拓展;无论是人物研究、事件研究,还是专题研究等方面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和创新。由此既突破了某些过去设置的研究“禁区”,也澄清了一些误识,出现了一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显然,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不仅为此类题材的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些新史料,使之有了新依据,而且也为其内容创新奠定了史学基础,使之更加充实和完整。为此,新世纪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的创作在表现历次党内路线斗争方面,较之此前一些同类剧作而言就有了不同程度的新拓展和新探索,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历史真实,并力求恢复历史原貌。

例如,《毛泽东》较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从1893年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人生经历和革命历程,其中就涉及各个历史时期一些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编导对此并没有回避或淡化,而是较好地作了一些艺术描写。如当年在瑞金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受到了以博古为首的部分中央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代理主任的顾作霖在与毛泽东、朱德等人开会时,就在会上点名批评毛泽东,要他离开红军队伍回到苏区政府做文职工作;朱德对顾作霖的做法颇为不满,要求顾作霖也撤掉他的职务。毛泽东因怕朱德与顾作霖发生争吵而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他认真考虑后便决定离开红军队伍回到中央政府任职。同时,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对邓小平也颇为不满,认为邓小平在执行罗明路线,故对其进行了责罚。当毛泽东得知中央批评邓小平时,便立即与朱德谈话交心,了解情况。朱德认为博古等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批评邓小平,实际上针对的还是毛泽东。当毛泽东得知邓小平被勒令从事惩罚性劳动而吃不饱,整天叫着肚子饿时,便立即来到关押邓小平的地方看望他。邓小平见到前来探视的毛泽东后,不便多说其他话,只是默默地接过他带来的红薯放到嘴里慢慢咀嚼。当时除了邓小平受到惩罚之外,贺怡也受到了降级处理。毛泽东知道这是博古等人在做样子给他看,是借此给他的一种警告;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大局,他只好叮嘱贺怡不要有过多怨言,以免被相关人员看到后再次给她以更重的惩罚。这一段剧情较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当时毛泽东、邓小平、贺怡等人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艰难处境,以及各自的心态情绪。同时,该剧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长征过程中党内、军内不同意见的争议,以及中共中央在何种情况下召开遵义会议等历史事件均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由此较好地反映了历史真相,较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革命大局为重等品格,从而既使观众对毛泽东的斗争经历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也使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与《毛泽东》相比,《陈云》则具有更强的纪实性,它全面、真实地叙述了陈云一生的革命经历。首先,该剧较详细地描写了陈云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斗争历程,其中也讲述了他如何在历次路线斗争中旗帜鲜明地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情况。如他在中央苏区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在遵义会议期间同意更换中央主要领导人,由张闻天替代博古,并支持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长征途中他受中央之命前往苏联,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他不仅如实汇报了遵义会议的内容,而且还指出博古执行的左倾错误路线以及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有了充分了解与认识,并认可

了中共中央更换领导人的举措。

其次,该剧对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在各种复杂的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经历、情绪、心态和做法进行了较细致的艺术概括和艺术描写,这也是此剧最有新意和突破之处。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分工主抓全国财经工作,他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等问题上逐步有了分歧。特别是中共“八大”以后,他和周恩来因为反冒进而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此后毛泽东直接抓经济工作,“大跃进”就是在批评反冒进中发动与组织起来的。在“大跃进”中,陈云反对高指标,认为居高不下的钢、煤、粮、棉指标难以完成,故建议这些指标不要在报上公布。他的建议当时被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挡回去了,后来胡乔木才向毛泽东汇报此事。由于事实证明陈云的建议是对的,所以毛泽东说:“陈云同志的话是很正确的”,并称赞陈云“坚持真理也勇敢”。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通过对“大跃进”教训的总结,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坚持批评反冒进,但却承认反冒进的一些具体做法是正确的,承认陈云抓经济工作时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此后的庐山会议使原定的纠“左”变成了反右。陈云在会前提出的一些被毛泽东肯定的意见也被搁置起来了,很难再贯彻实施。1962年陈云在下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认为“分田到户”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也因此被扣上了“老右”和“老机”的帽子。1962年夏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而其中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都指向了陈云。北戴河会议前,陈云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将成为这场风暴冲击的对象之一,再加上其心脏病复发,便决定请假养病。中央批准了陈云的请求,此后陈云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文革”期间,他被疏散到南昌,仍坚持在基层调查研究。1972年4月他回到北京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1976年他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复出并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还主张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应平反“61人叛徒集团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并要求中央根据康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对其重新作出评价和处理。为此,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党籍,

撤销悼词,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康生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为彻底平反刘少奇、潘汉年等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些剧情内容不仅真实地展现了陈云不平凡的一生经历,凸显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而且也从一个侧面概括反映了中共党史的一些重要篇章。

同样,《开国元勋朱德》一方面较详细地叙述了朱德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曲折艰难的革命经历,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情感;另一方面也用一定的篇幅讲述了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的思想情操和高风亮节。该剧在叙事时没有回避建国后大跃进、庐山会议和“文革”等一些较敏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而是适当地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艺术概括和艺术表现,从而使朱德的艺术形象更加真实亲切。例如,朱德在庐山会议期间一面替彭德怀辩护,一面又让彭德怀主动去找毛泽东谈话,以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而当彭德怀遭到严厉批判,并被解除领导职务后,朱德没有像部分领导人那样,或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或与之划清界限;他不仅主动去看望彭德怀,对其艰难的处境表示同情,而且对他的生活表示了热情关怀。由此表现了朱德敢于坚持真理、不怕牵连的正直品格,及其仁者之心和坚强的党性原则。虽然编导对这一段历史的艺术概括和艺术描写还比较简单,但能够较真实地叙述这些历史事件已经实属不易了。

又如,《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并没有全面描述邓小平一生的革命经历,其剧情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27天开始,直到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建国35周年国庆游行队伍时,走在队伍里的大学生自发地打出代表亿万人民心声的横幅“小平,您好!”为止。剧作较细致地描写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邓小平再次出山后党和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讲述了他如何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对“两个凡是”“两个估计”错误思想的批评,领导和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他如何指挥拨乱反正,与胡耀邦、陈云等一起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他如何决定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支持知青返城,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考察;他如何促进农村改革,不断解放农业生产力;他如何参与中国与美国、日本相继建交,并

在与英国谈判收复香港时一锤定音；他如何南巡视察深圳特区，进一步推动全面改革开放；他如何决定实施裁军，促进军队改革等一系列政治经历。剧作描述的这8年历史进程，既是邓小平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人生经历，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处于最微妙、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剧作对这一阶段发生的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和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状况，如粉碎“四人帮”、华国锋成为接班人、邓小平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如何胜出以及如何领导拨乱反正等，都进行了较直接的艺术描写，较好地概括和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原貌。同时，邓小平家庭一些真实的生活场景和生活内容，也在剧中多有表现，由此既较全面地概括反映了从1976年至1984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成功地塑造了邓小平晚年的艺术形象，让广大观众感到十分亲切，并产生了情感共鸣。

显然，上述剧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角度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新意，不仅使其避免了与以往同类影视剧的重复雷同，而且也有助于其更好地强化历史真实性，增强艺术感染力。应该看到，当下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的创作，如果完全回避或有意淡化党内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许多党内路线斗争、思想斗争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党史上已有结论，已经不再是创作禁区；故而对此只有真实而恰当地予以艺术概括和艺术表现，才能使剧作内容和人物形象更接近于历史原貌，从而既体现出创作者对党史和历史的反思，也能使剧作内容和人物形象更有新意。

二、于爱情婚姻中见品格

对于每个人来说，恋爱婚姻不仅是人生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也能真切地反映出各种人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点。正如黑格尔所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止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示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①此事对于那些革命领袖人物来说，当然也不例外。而传记剧的创作把人物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作为重要内容，不仅能丰富剧作的叙事情节，而且也能由此较深入地刻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这方面内容在此

^① 黑格尔：《美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2页。

前一些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中或被完全忽略,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往往语焉不详、点到即止;这样的艺术处理既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感,也削弱了人物思想和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人物形象缺乏丰富的感情色彩,无法使其产生打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新世纪以来,革命领袖人物传记剧的创作对这些内容较为重视,不少剧作在这方面均有较详细的艺术描写。例如,无论是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的恋爱婚姻,朱德与萧菊芳、陈玉珍、伍若兰、康克清的恋爱婚姻,毛泽民与王淑兰、钱希均、朱旦华的恋爱婚姻,还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恋爱婚姻及其与家人、亲戚的关系,彭德怀与刘坤模、甫安修的恋爱婚姻及与美国记者安娜的感情纠葛,抑或是陈云与于若木的恋爱婚姻、任弼时与陈宗英的恋爱婚姻、聂荣臻与张瑞华的恋爱婚姻等,在相关电视剧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较生动的艺术描写。这些故事情节既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特点、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操品格,也有助于丰富剧作的思想内容,增强剧作的新鲜感和观赏性。因为这些情节内容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平时知道的并不多,所以观赏时就觉得较为新鲜有趣;而对于人物形象塑造而言,这些故事内容的艺术表现则生动地展现了人物个性的另一些侧面,从而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革命领袖人物的精神情操和感情世界。

譬如,《毛泽东三兄弟》对毛泽民先后与王淑兰、钱希均和朱旦华三个不同性格女性的恋爱婚姻情况就描写得较为细致生动,从而有效地丰富了剧情内容。王淑兰是毛泽民的结发妻子,是一个缠足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但婚后两人却相敬如宾、十分恩爱,并先后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了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的孩子都先后夭折了。当毛泽民跟随大哥毛泽东离开韶山到长沙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后,王淑兰因为没有文化,又是缠足女性,不方便随其到处奔波,故而仍留在家乡。她怕自己拖累了毛泽民,遂强忍内心痛苦,主动提出与毛泽民离婚;毛泽民虽然不愿意离婚,但后来考虑到实际情况,还是同意了。王淑兰虽然离开了毛泽民,但她仍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毛泽民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时,因为工作需要,党组织安排他与纱厂女工出身的地下党员钱希均假扮成夫妻。两人最初生活习惯和性格不合,在一起总是磕磕碰碰,发生各种矛盾;后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特别是在斗争生活中进一步了解了对方,相互配合开展工作以后,遂逐步产生了感情,最终经组织批准结婚成为一对真夫妻,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共进。

后来,因毛泽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遂经中共中央批准,他在钱希均陪同下由延安赴苏联治病。1938年2月路经新疆迪化时,由于苏联边境暴发鼠疫,他和钱希均被迫留在迪化,当时他化名周彬。驻守迪化的国民党督办盛世才借机向中共中央提出借人请求,要求借周彬为其整顿新疆财务,并任命其为省财政厅代厅长。在周彬的整顿下,新疆的财政逐渐步上正轨。此时朱旦华在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后又被推选为新疆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并担任了新疆政务委员会委员,是一个年轻能干的妇女干部。朱旦华曾多次听过毛泽民的报告,知道他是理财专家,工作能力很强,故对他颇为尊敬。同时,两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一起开会,彼此也逐步熟悉起来。而钱希均此时一直没有落实具体工作,她越来越感到自己在此地没有用武之地,也觉察到毛泽民与朱旦华之间的感情;于是她向中央提出了回延安前线工作的请求,同时也要求与毛泽民离婚。毛泽民虽然不愿意离婚,但他尊重钱希均的选择,并服从组织决定。钱希均离开后,由于毛泽民身体不好,工作又繁忙,身边需要人照顾,在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撮合下,毛泽民便与朱旦华结合了。

可以说,剧作里这几段爱情婚姻的描写不仅使故事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从另一个侧面较生动地展现了毛泽民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使其艺术形象充满了生活气息。由于两次离婚都是女方主动提出来的,毛泽民并没有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而抛弃妻子,他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女方提出的离婚要求;所以,他对待恋爱婚姻的态度还是很严肃的。

又如,《彭德怀元帅》除了较全面地描述了彭德怀的革命斗争经历,表现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战斗意志、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严于律己的品格之外,还叙述了彭德怀与刘坤模、浦安修的恋爱婚姻,以及他与美国记者安娜之间的感情纠葛。这些情节叙述和艺术描写对于揭示彭德怀的内心世界,生动、形象地表现其人品和情操是十分有益的。

刘坤模是彭德怀的原配夫人,1922年在亲友撮合下,彭德怀娶了货郎之女刘细妹,并给她改名为刘坤模,意为“女中模范”;还让她放足,教她读书写字。1928年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时让她回家,答应革命胜利后去接她,不料

两人从此失去联系。刘坤模在战乱中以“匪属”的身份漂泊辗转,历尽了各种艰辛;后来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汉口另嫁他人,生有一女。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坤模从报上得知彭德怀已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了,便写了一封信给他,信封上写“平型关彭德怀收”;此信居然让彭德怀收到了,彭德怀很高兴地回了信:“坤模妹,在枪林弹雨中收到你的信,很兴奋。你要来,可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主任。”于是,刘坤模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延安,并见到了彭德怀。虽然此时两人仍然彼此相爱,但却不能破镜重圆。因为彭德怀在得知刘坤模再婚的情况后说:“孩子不能没有母亲,我也不能和别人共用一个老婆。”他随后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刘坤模,让她好好生活。此后刘坤模也参加了革命,并又另外嫁人。虽然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一段婚姻已经结束了,但他内心深处仍然铭记着刘坤模。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他曾对身边人说,十分想念刘坤模,表现了对她的深厚情感。当然,这一段情节在电视剧里未能予以表现。

彭德怀与美国进步记者安娜的情感纠葛则是安娜的一厢情愿。安娜于1938年1月跋山涉水来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她相继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收获不小。她每天与八路军指挥员、普通工作人员一起进餐和交谈,向他们询问各种敌后抗战情况,由此对八路军指挥员和战士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对彭德怀由敬佩而产生了感情,但彭德怀却对此没有察觉。后来,彭德怀奉命到延安参加中央会议时,再次碰到了安娜,她便开门见山地向彭德怀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彭德怀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安娜虽然很失望,但却没有因此影响她对彭德怀的敬佩和爱恋之情。

彭德怀与浦安修的恋爱婚姻也是其人生经历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浦安修原是北平的女大学生,抗战时期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和彭德怀的接触过程中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因双方地位悬殊,文化程度和年龄方面也有差异等原因,彼此对爱情婚姻都有一些顾虑。后经李富春、陈赓做媒,彭德怀和浦安修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则因思想、文化和性格上的差异,两人在生活中难免会发生一些矛盾冲突。彭德怀整天忙于工作,对浦安修缺乏较多的关心照顾;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要求不高,与追求生活情趣的浦安修常有分歧;他处理家庭问题的方法往往简单粗暴,有时候也会影响彼此情感。如浦安修参加赴朝慰问团到朝鲜看望彭德怀时,他只让浦安修